

湘江头条

从江南到江南：在田野考古中认识长沙窑

刘太远

西黄庄遗址处于南京市域范围中的长江北岸，以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存为主，在建中的沪渝蓉高铁从遗址中部穿过。2024年5月中旬，为厘清遗址的文化内涵，配合制订更好的遗址保护规划，由南京博物院组织牵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参与了其中部分探方（南大发掘区）的发掘工作。

刚开始的几天，探方里的工人老刘在休息时和我聊起了他小时候的一段记忆：“那时候有不少湖南人在南京这边做生意，他们把橘子从湘西经沅江、洞庭湖、长江运到这里，这些人的性子很野。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南京人和他们因价格问题打了起来，橘贩团结，很快就占了上风。”说完，我们在隔壁上哈哈大笑起来。我和他虽在某种意义上均为打架事件当事人的同乡，但多年过去，已经没有任何龃龉可言了。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发掘之余，我和包括老刘在内的很多工人聊了不少南京和湖南的话题，它们既是故事，也可以说是历史。时间就这样往后走着，直到3个月，导师突然问我：“你老家是哪里的？”

天很热，埋头铲刮唐宋层探方面的我已全身湿透。我猜导师问起这个问题是想舒缓略显艰苦的工作氛围，我的回答却带了些学术的影子：“老师，我在贵州长大，我先是实打实的贵州人，不过身份属性本不具有唯一性。我父亲一方的祖籍在怀化，母亲一方的祖籍是张家界，搬来贵州仅百余年，所以也可以说我是湖南人。我长大的地方本就是湘黔之界，所以湖南人这个身份还是比较地道的。”

就在这段对话发生后的两天，同处一片发掘区的T35，其唐宋文化层便出土了一块长沙窑的瓷罐残片，该器的装饰特征是“青釉褐绿彩连珠纹”。经发掘者啧啧称奇后，老师、同学都聚拢到了残片周围。与他们的激动相比，我略显平静，我的研究旨趣不在瓷器，但湖南人的身份还是让当时的我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它大致与时空交错相关。

此后老师将撰写发掘区工作汇报的任务交给我，重新取出长沙窑瓷片后，我才开始认真审视它。师妹此前先找到了

同类器的资料，即扬州博物馆藏（以下简称“扬博”）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看着眼前这件仅有二十几厘米的瓷器残片，我实在难以将它和作为“镇馆之宝”的扬博同类器联系起来。

2024年底，我再次受命撰写发掘区工作报告。从报告的构思到行文，我均未花费太多精力思考这件长沙窑残片之于西黄庄遗址性质的价值问题。然而，年末的一天，我关于工作报告的思考重心有了转折，原因是我在长沙博物馆参观了长沙窑的特展“我有方寸心——唐长沙窑瓷器诗文特展”。

进入长沙博物馆是无心之举，但走到陈列现场后，周身均是长沙窑瓷器的语境很容易让我想起夏天在西黄庄遗址见到的长沙窑残片。从陈列的起点行经中点，眼看到了终点的开端，我都还未见到相似度较高的器物，就在我略显失望准备走出展厅时，结尾处的一件展品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便是我此前通过电子材料了解到的那件扬博藏品“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

通过馆与馆之间借展的形式，这件远在江南的瓷器回到了它的故乡湘江畔。而湖南，也曾是历史上的“江南”。杜甫曾在长沙写下过《江南逢李龟年》，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之名句。在这件瓷器诞生的唐朝，江南道的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西、湖南、湖北长江以南部分。巧合的是，此刻我也在回乡路上，行程的交叠让我心跳加速。

我在看展的人群中立定了很久，走出博物馆时已是下午5时，暖黄色的夕阳倾泻在浏阳河与湘江的交汇处，我忍不住以艺术加工的形式复原起那件长沙窑残片的生命历程：千余年前，一个秋冬之交的傍晚，河岸的工人终于将这些准备外销至东南亚的瓷器稳稳地装进了船舱，随着船老大一声令下，连串的舟船缓缓北上，逐渐融入余晖中。半月之后，船队中的一艘行船搁浅于江南的长江北岸，船舱中的部分瓷器因而破碎，在一片不悦的气氛中，船工扔下了瓷器碎片，剩余的完整瓷器继续前行，前往大都会扬州中转。

沧海桑田，千余年后，其中的一块碎

片出现在了个湖南的考古学学生标本袋里……临近傍晚，湘江江面依然船行不止，它们有巡游橘子洲头的游船，载运建筑材料的货船，装满长沙窑瓷器的木船乍一看虽然不见了，但是认真地跟着拍打至岸边的波纹回溯，在江中的航道上，却也能见到一艘历史的行船。

晚唐的那段岁月里，船老大大在出发时，岸边是不是也坐着一个同我一样的人？我相信有，因为湘江未曾停歇。

参观完后，我觉得应该将这件长沙窑残片作为一个重点写进工作报告里。坦率地讲，这一做法是带有私情的。同为老乡，这是我将它带回故乡的一种尝试。作为一名考古学学生，这无疑也是田野考古的浪漫所在。

时间来到2025年国庆，工作报告早已完成，就连发掘区简报的撰写工作也已经临近尾声。再次来到长沙，我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此行我将其中一部分时间继续花在了参观长沙博物馆上。这时的特展已经变成了“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展览以长江为纽带串联起来的流域历史横贯史前和历史时期，其中的区域传承性和一体性再三地提醒着我，讲述湘江北去的故事，千年的维度远远不够。

作为一个在外求学的考古学学生，除开期待在湘江畔与更多返湘文物相逢，我能做的还有什么？我貌似也寻找到了一个人生命题。

长沙窑的一大特征是其所产瓷器器身常见唐人诗词，个人印象最深的是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如果我并不了解考古学，面对以上两句诗，我产生的可能尽是时空交错的别离愁绪与遗憾，好在我是一个学了些考古的学生，它助我在遗憾之外多了几丝欣慰。

我们不仅以田野考古的形式在如今的江南一隅重逢了，所谓“他乡遇故知”；亦以田野考古的形式手挽手、一起踏上了归向故乡——唐时“江南”的路上，“长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放眼望去，一切都还是出走时的模样。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博士研究生）



左图：扬州博物馆藏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1974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右图：作者在南京西黄庄遗址进行发掘。



资料图 作者供图

故园琴音远

荣小平

先生对他格外欣赏与信任。改革开放后，张克刚先后十几次赴上海探望、采访先生，每次都能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那时我任邵东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电视台台长，张克刚每次从上海回来，总会到我的办公室，把他和先生会面的细节、带回的资料细细讲给我听、拿给我看。

1995年秋的一天，刚从上海回来的张克刚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这次跟先生特别提起了我，说我也在收集先生的一些资料。随即他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将听筒递到我手上。“您好，贺老！”因激动与紧张，我握着听筒的手有点轻颤，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十分亲切随和的声音，没有半点架子。先生笑着邀我：“下次到上海，欢迎到我家里坐坐。”我也连忙恳请他回故乡看看，电话那头，先生的笑声顿了顿，带着几分无奈：“我也想啊，可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呀。”末了，他又叮嘱我：“要是家乡现在的影像资料，让克刚下次带来给我看看。”

如今再次站在先生故居的铜像前，他温和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萦绕。这位从未扛过枪的战士，当年却以笔为武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写下了震撼人心的《游击队歌》。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4岁的贺绿汀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

建的救亡演剧队，随队赴南京、武汉等地演出，最后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正在开展游击战，依托山地丛林灵活打击日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热情接待了贺绿汀一行，并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还带他们参观了当地由缴获日军武器组建的炮兵团，贺绿汀深受触动。

回到临时住处后，贺绿汀辗转反侧，八路军游击队伍的各种画面在脑海里闪现。一天晚上，同屋的戏剧家欧阳山尊外出，贺绿汀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借着油灯，以小军鼓的节奏为灵感，先写出了旋律，然后填上歌词，一夜之间完成了《游击队歌》的创作。1938年年初，在八路军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这首歌进行了首演，由贺绿汀亲自指挥，欧阳山尊吹着口哨当伴奏，歌声让大家深受感染。此后，“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旋律，像战鼓般响彻神州，激励着无数军民奋勇向前。

而贺绿汀的音乐成就，远不止《游击队歌》。他创作的《牧童短笛》《摇篮曲》等作品，以灵动旋律勾勒生活图景，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经典；还曾为《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经典影片配乐，用音乐为时代叙事；在音乐教育领域，他更是贡献卓著，深耕不辍，推动着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发展。

贺绿汀的童年，便是在这老屋中度过的。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父亲贺延龄是个朴实的农民，母亲则操持着家务，日子虽清贫，却从未亏过他读书。六岁时，先生便跟着私塾先生识字，后来又进入本地的高等小学堂。那时学堂里有架旧风琴，每当课后，他总忍不住凑过去，摸着琴键琢磨音调，谁也没想到，这份对声音的好奇，会在日后生长成支撑民族精神的音乐力量。

后来他离开家乡，赴长沙、上海求学，再到赴法国深造，一步步探寻音乐的真谛。可无论走多远，故乡的山水总在他心里。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国投身救亡运动，用音乐传递抗争的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身居高位，却始终惦记着家乡的教育与文化发展，多次托人打听邵东的变化。

夕阳透过故居的木窗，洒在先生用过的旧书桌、乐谱架上。桌上还摆着他当年修改乐谱的钢笔，笔杆早已磨得光滑。我轻轻抚摸着桌沿，仿佛能看到先生伏案创作的身影，他写的是音符，藏的却是对祖国、对故乡最深沉的爱。

八十年光阴流转，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先生用音乐铸就的精神丰碑，仍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我知道，先生的故事，定会和他的音乐一起，永远被国人铭记。

你好！
湖南国保

百年老树的守望

刘义彬



徐特立故居。

作者供图

简介

徐特立故居位于长沙县江背镇特立村观音塘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成长和早期从事教育的地方。故居始建于清朝末年，由徐特立过继后的伯祖父的父亲所建，属典型的清末江南四合院建筑，占地约5700平方米，建筑面积580平方米。

这是一个古木参天的清幽院落。暖阳之下，白色的围墙将满院子的葱茏和幽深裹在其中，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门前潺潺流过，像一个长长的破折号，经年不息地讲述着院子里跨越三个世纪的沧桑往事。

这是长沙县江背镇特立村观音塘组的徐特立故居。故居坐西朝东，前临田野，后靠小山。走过院子门前的小桥，推开两扇黑黢黢的木质槽门，首先进入视线的便是十几棵树龄120多年的遒劲侧柏、法国松和硕大樟树。古木掩映之下，一幢砖木结构的传统四合院民居就在眼前。

进入四合院，房子两边首先各有一间教室，与教室相邻的是教师宿舍。教室里仍整齐摆放着几列黑漆斑驳的旧木桌椅。左边教室讲台边，立着一位瘦削的老师铜像，正微笑着低头倾听面前的学生说话。

左边的两间厢房和一间正房被辟为徐特立生平陈列馆，大量的照片、文字和实物资料对徐特立光辉的一生作了详尽的介绍。正面堂屋的门楣上悬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底金字木匾，上书“坚强的老战士”几个毛体字，这是徐特立70岁生日时毛泽东主席的题字。

院子右边的正房是徐特立夫妇的寝室，厢房则是他们两个儿子徐笃本和徐厚本的卧室。右边的侧厅正中立着圆桌，是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期间用过的餐桌。右后方有一间面积颇大的灶屋兼厨房，屋顶开了一扇天窗，明亮的阳光从天窗射进来，在地板铺上大块金色的光斑，将这幢两百年前的静寂老屋衬托得更加幽深，让我仿佛看到时光深处那个匆匆走来的热血少年。

徐特立生于1877年，4岁丧母，12岁被过继给观音塘的伯祖母，在这栋老房子里继续他的学业。其时伯祖父刚刚过世，家里给他娶了个童养媳，一家老小三人相依为命。

从18岁开始，徐特立在附近的一家蒙馆教书，但所得收入仅可供日常用度。苦于没钱买书，20岁的他制定了一个破产读书的计划，拟分10年时间逐渐将家里的水田变卖掉，用来买书学习。在邻居们的一片议论声中，他得到了妻子熊立诚的坚决支持。漫步在徐特立故居，天井里的两株桂花树格外引人注目。树冠高耸入云，一个成年人难以合抱，这正是徐特立在20岁那年亲手植的。

1904年，徐特立走出观音塘，来到岳州（今岳阳市）参加清朝改革后的取士考试，从3000多名学生中选出第19名的成绩。初试成名之后，他怀着对清廷的蔑视，决然地放弃复试，选择来到宁乡驻省中学速成师范班学习。四个月毕业后，他先后在长沙的周南、长郡、明德、修业等学校担任教员、校长。

1913年，徐特立回到观音塘老家，用教书所得的薪资对自家老屋加以改建，创办了五美高级小学，他和妻子则搬到后面的茅草房居住。因徐特立当时在长沙任职较多，五美高小后来交由妻子负责管理。此外徐特立还先后

在长沙创办过平民夜校、梨江小学、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等多所学校以及湖南孤儿院，竭尽全力救助和教育贫困学生。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时，为节省开支用于教育，经常徒步40多公里从老家走到学校。这期间，他曾先后任过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蔡和森、田汉等人的老师，被称为湖南教育界最受尊敬的“长沙王”。1919年，42岁的徐特立告别家人，只身赴法国勤工俭学。5年后回国，他受聘为国民政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927年，徐特立回到观音塘老屋，在周边做了一周时间的调查，对当地活跃的农民运动深表赞扬，准备在学校开展马列主义教育。此时，徐特立的大儿子，中共党员徐笃本牺牲，悲愤中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妻儿诀别并全心投入革命。1934年，他57岁，参加红军长征，成为长征路上年纪最大的兵。

1937年12月，徐特立受党中央指派从延安回到长沙，负责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全面工作。分别10年之后，他得以回乡与妻女相聚，并将妻子从老屋接到长沙。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曾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因为工作忙碌和身体原因，他们夫妇回故居的次数并不多。

“徐二爷要回乡啦！”1956年6月，一个喜讯传遍观音塘。那时，公路还只通到邻近的江背，下车后还要走10公里山路。乡亲们说，徐老80岁了，不能让他老人家爬山越岭，我们用轿子接他回来！这天上午，看到20多个抬着轿子在江背恭候的乡邻，徐特立一边亲切地打招呼，一边连连摇头，执意拄着手杖，与乡亲们一起，说说笑笑走着路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观音塘老屋。

故居天井里，还有两棵年轻的柚树，这是2002年徐特立的孙女徐禹强回来时补栽的。此前这里原有两棵近70年树龄的老柚树，是徐特立和7岁的小儿子徐厚本于1924年一起栽植的。柚树每年硕果累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徐老每年还能品尝到从老家寄去的柚子。1968年11月28日，徐老在北京医院病逝，两棵老树也于1991年的一场冰灾中冻死。

唏嘘之间，我从故居右边的侧门走出，循着一条青砖小道来到后山坡。这里满是一百多年的硕大枫树、银杏、马尾松、樟树等，其中两棵银杏树为徐特立15岁时所栽。一阵音乐声传来，将我的目光牵往铁栏杆外隔壁五美中学。正是课间休息时间，一群年轻的学妹学妹们刚从教室涌出，在篮球场上奔跑，在操场边散步聊天。恍惚之间，我看到了40年前我和同学们跳跃嬉闹的场景。徐特立先生从不曾孤寂过，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学子在这里陪伴着他。

此刻，后山坡上银杏树将头上的蓝天遮掩得严严实实。只余点点细碎的阳光，从树叶的空隙间跳荡而下，坠落在我的脸上、身上，像是向我叨念着它们所熟稔的那位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老人，如此执着，如此温情。



青年贺绿汀。

资料图

秋日，我又一次踏上了邵东九岭镇新庵堂村的青石板路。依山傍水的“凹”字形院落静静伫立，前塘鱼跃，后岭松青，这座清同治五年（1866年）始建的砖木老屋，正是人民音乐家《游击队歌》作者贺绿汀的故居。风掠过院角的老桂树，恍惚间，又把我拉回到了30年前与贺绿汀先生那通短暂却难忘的电话时光里。

贺绿汀先生晚年总牵挂着故乡的发展。作为老新四军战士，他与邵东文化馆的张克刚结下了忘年交，张克刚曾是我党湘中支队的地下交通员，同为邵东老乡的缘分加上共同的革命经历，让